

校园称呼非小事 价值塑造蕴其中

杨斌

校园霸凌对青少年的伤害,比人们想象中的要更普遍、更严重。除了恃强凌弱、以多欺少、以大欺小等身体上的直接伤害之外,冷暴力对于更希望被群体所接纳的学生们来说,隐性伤害的深度、持久度,更有甚之。因其逾越的伦理、法律界限并不清晰,也许是成年监护人关心不够,也许是教师忙于应对大量学生而很难体察细致,或是工作作风粗放不敏感未能及时干预、帮助,积极地排解和引导。于是,伤害既成。特立独行、持创异见者也可能成为被排挤、讥嘲的对象,成为某种少儿样式的群氓对异类的心理霸凌。

其中,五花八门的让学生经受不起并产生负面情绪反应的“恶意指号”,是一种在师生家长的理解中尚存在争议的校园霸凌。有研究机构调查显示,大城市中40.7%的中小生都曾有过被叫难听的绰号的经历,这是个令人惊心的比例。恶意指号给学生特别是低年级的学生所带来的伤害远不止父母想的那么简单。学生在这个年纪心智尚不成熟,心理失衡难以调节,对父母和他人缺少求助的勇气,对恶意指号往往比成年人更加敏感、心理更加脆弱,容易陷入归因于己的思维怪圈。一些父母也常有苛责于被霸凌者的错误行为,进而导致学生产生自卑、压抑和厌世等负面情绪。即使度过了这一段,成年后仍可能会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因戕害造成的心理行为特征。

恶意指号之外,还有些称呼,也许并非恶意,但也会因为潜移默化、日久生成的心理内化效应,对校园中的学生成长、师生关系、校园角色分工、中外师生融合,产生重要的影响。应当说,这方面的后果影响,目前还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对其造成的负面影响的深度、广度和持久性的认识还相当缺乏。

我曾经撰文探讨过校长院长们,不该再动辄称呼学生的父母以及其他家庭成员为“家长”,这样的称呼对于促进大学生跳出家庭舒适区、通过社会化的过程找寻和确立自己的独立人格、身份认同、责任意识,是不利的。对于关心他们成长的父母、亲友们,也会有不恰当的引导。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需要有机地结合,但这绝不意味着,在中小学阶段的家校共同体,要以大学阶段的家长会、家长联谊会、学校对话大学生家长的方式来延续。

老板,则是另外一个值得引起足够重视的称呼。困扰研究生培养质量提升、研究生立德树人目标达成的重要关键之一,就是导学关系。什么是研究生教育中导学关系的基本伦理?导师是为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而服务的,而不是为成就导师的科研成果或是学校的创收任务而服务的。导师,对学生而言,是学术上的引导者,也该是品德上的榜样。

己欲立而立人,学生的顺利成长、全面发展,是导师的成就感的真正来源。导师与学生,是一段共同做学术探索的经历,也是一生相互尊重彼此促进的缘分。这种将研究生作为导师科研项目的高层次人力资源(也有人称之为“苦力资源”)的做法,是经济雇佣关系甚至某种人身依附关系渗透、浸淫到学术界形成的病态,阻碍师生之间树立健康良好、教学相长的学术研究共同体关系,阻碍着学生的批判性思维、独创原创性等创造力的培养和发挥。

还有一类称呼,是学霸与学渣、差生与牛娃。学霸在旧时常用来形容指借势力或权威把持、垄断教育界或者某一学术领域的人。而今成了新闻舆论、媒体宣传中的常用词,转义为擅长学习、成绩优异、遥遥领先的学生。与之相对的,则是成绩不理想、学习吃力、久居下游的学生自称为学渣。学校蒸蒸日上,某些校友网络发言时还会自嘲说“校强我渣”。同样的,在一些教师的言语中,甚至一些校长的发言中,也经常说到“差生”这个词,一般特指学业成绩差、排名落后的学生,相对的,用于表扬学生的一个新词,就是“牛娃”,强调功课学得早学得多学得

深,远远超前,让其他同学望尘莫及。这一类称呼听多了,似乎大家也觉得习惯了,没什么大不了的。但从教育心理学和育人的规律来深究,其实问题多多,危害潜在而长远。不同阶段的学生,即使是到了大学研究生阶段,也都仍在探索、进步,也都充满全方位的成长性。对于学生阶段性的状态,冠以一个标签式的称呼,可能产生负面导向的皮格马利翁效应。学渣、差生等更看重学习成绩,或者说与升学有关的学习成绩这单一的维度。这种导向,对学生会有潜在的暗示引导,使本该丰富、全面、长期的学生素质发展,堕入单一的知识竞赛、课业竞技和分数游戏中。

学霸的霸字,让学生成长的视野窄化、目标变狭隘,滋生学生间聚焦在校园内部的、学生相互之间的比较、博弈,而不是积极地鼓励学生不断超越自我;学霸的霸字,也与谦虚虚心、团队合作、敬业乐群的价值取向相甚远,从品格示范的角度,也算不上高明、明智。小时了了,大未必佳的教训很多。牛娃的头衔可能会成为学生、父母的包袱,甚至使其为名所累,一味追求提前学,盲目加大投入各种恶补抢跑,最终被牺牲的是学生本应有的健康、快乐与从容,还会加剧整个社会在排位竞赛中的焦虑与惶恐。

所以,我明确主张:对于学霸、学渣、差生、牛娃等这类对学渣的全面包容成长不利的粗暴称呼,任课老师、班主任老师首先不要用,学生之间、学生的亲友们不要用并敢于对用的人说不。校长、教育局长们自己不要用还要督促校园远离这些单维度尺子,而极有影响力的新闻媒体朋友们也应尊重教育规律,讲求报道格调,予以戒除。

对于教师,校内的很多场合,要慎用“大师”“美女教授”“名嘴”等称呼,在课程教学、师生开放交流的环节和过程中,老师或者教授的称呼都是自然而恰切的,也不必过于强调教

师的其他学术头衔(帽子),不必刻意区分教师的支撑差异,更不该以其扮演的其他角色如行政职务等来称谓,这不仅仅涉及到如何构建更为平等自由交流、平视而非仰视的学习探讨氛围的问题,也是希望纯化教师在教书育人中的角色。

美女教授,的称呼让很多女教师心中不平,这并非因为美女二字在当今社会的人际交往中变得廉价、泛滥之故,更是因为这种界定与刻画,对学术组织、教育机构中的女性是一种不尊重、不平等、角色异化。名嘴,用在很多教课受欢迎的老师身上,是一种对于教师、课程、课堂教学的本质的误解,是对于什么才是真正的优秀的教学表现的一种误导,也会造成学生对于课程教学定位、自身主动投入、建构学习准备度上的偏差。

而教师教学中,除了我们常强调要讲求语言格调、避免歧视性禁忌之外,还有个特别的建议,就是对于学生的称呼上要慎用“孩子”一词。现实情况是即使到了大学生研究生阶段仍然不少时候被教师口头叫作孩子,中小生更是家常便饭,整天孩子孩子短。

从落实教育立德树人使命的角度,要从称呼上把学生当独立的个体的人,集体中的一员,而非需要监护的孩子。学校肩负人格养成任务,只有学生和教师在课堂称呼孩子,是角色错位。即使是幼儿园,以小朋友来称呼要比孩子更得体。

角色定位不是小节,这个教育的细节体现着最深刻的教育意识,可以说教师如何称呼学生是一门潜移默化却每天都在上的隐性课程,关系到学生独立的身份认同的建立与厘清,对自己为人而应承担的责任的体认与拥抱。

学生们参加社会活动,参与团组织,也有两个关于称呼的提醒。一是不要动辄就说“校方”,二是能否少些官称。我听到一些学生代表、学生组织的发言中以校方来指代学校,很

多时候指的是学校领导、管理层,但也有不少时候,就是指除了学生之外的学校其他部分。不只是语气里过于正式透着生分,这种称呼本身出现在校长接待日、学代会、征求意见会并表达意见(我完全认同同意是正当的,也应该是经常的)时,常让我想起,学生是否因此忽略掉自己作为学校的一员、学校建设者一部分的角色?是否是某种顾客心态的显露?学生组织中,主席多、部长多、会长多、团长多,而且还经常出现在学生之间的日常称呼中。服务型领导力的培养,学生时代的社团训练、社区锻炼、社会历练是个很好的开端。但也许可以首先更能认清自己作为服务同学服务社群的服务员角色开始,从称呼上保持更朴素的学生气而戒除官气做起。

往远一点展望,随着高校全球人才培养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学生的全球胜任力的进一步提升,留学生这个称呼也许还存在,但是针对留学生的很多管理政策一定会走向普通,留学生将成为普通学生群体中的有特色的但却是普通的一员。

同样,大学中的外教这个称呼,目前在校环境中主要不是根据教师持有外国国籍而论,比如特指讲授语言文化类课程的教师,这在外籍教师凤毛麟角的过去是正常的称呼,但未来伴随着教师群体不断多元化、全球化,也会不再特别、特殊,而是将融入普通教师的行列。融入普通,发挥特色,这不仅是称呼问题、分类问题、管理问题,背后也有着文化、伦理的大问题,也体现着我们的教育更加自信、更有定力和吸引力。

称呼非小事,价值蕴其中。称呼太常见,使用频率极高,也因此,价值塑造、价值观体现与传递的功能就极强。称呼欠考量,角色、责任、任务、边界、规范、导向乃至使命,都有可能出现偏差。兹事体大,不可不察,绝不能将就,而必须讲究。

立德树人,不妨从用对称呼做起。(作者系清华大学副校长、教务长)

以“过紧日子”为契机 提升高校治理效能

杨维东

近日,多所高校密集召开会议,商讨如何在新形势下做好经费预算调整,统筹推进“过紧日子”与学校事业发展工作。当前,受到全球疫情和经贸形势不确定性的综合影响,我国发展面临着一些难以预料的影响因素,财政整体上面临着减收增支压力,中央和地方财政运行仍将处于“紧平衡”状态。具体到高等教育领域,在今后一段时间,高校获得的事业收入、经营收入等财政拨款以外的各项收入,也可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减少,高校的正常运转面临压力和挑战。

在当前的“紧日子”背景下,能否在用好财政资金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拓展办学资金来源渠道,支撑人才培养、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三大使命,考验着我国高校管理者的治理效能,也考验着一所高校的整体治理效能。

在这一背景下,我国高校纷纷采取措施,树立勤俭节约、过紧日子的思想,严格加强预算管理,大幅度压缩一般性项目,降低公共运行成本,提高资源优化配置和资金使用效率。应该说,这些措施是应对挑战的必要之举,也是“过紧日子”题中应有之义。

但过好“紧日子”,仅仅采取这些措施是远远不够的,还应在做好减法的同时做好加法,开辟更多新的渠道弥补财政经费的缺口,节流与开源并举,多维度、多渠道筹措资源。已有部分高校对此做出部署,如厦门大学近日提出要整合校内外优势资源,拓宽发展渠道,主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千方百计争取办学资源,为加快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实现内涵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相对于节流,开源的内涵更为丰富,具有更大的扩展性,与高校战略发展的结合度也更高,是今后我国高校在“双一流”建设过程中实现差异化发展的必由之路。相应的难度也更大,节流只需通过行政方式就能解决,而开源能力则与人才培养质量息息相关,与社会认可度紧密相连,融合了多种手段,需要搭建多个平台。高校“过紧日子”,应以此次疫情应对为契机,在不断提升财务治理效能、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的同时,更为积极主动地谋篇布局,妥善处理节约与拓展的关系、财政资金与其他资金的关系,两手抓、两不误,借鉴世界一流大学管理实践,提升自身资源筹募能力,健全资源筹募与管理体系,多维度、多渠道筹措办学资源。引导这些外部资源支撑那些财政资金不能、不够用、用不好的领域,实现两种来源的互补与协同。

在多渠道筹资过程中,社会捐赠资金是重要来源之一,在“过紧日子”背景下,应筹好、管好、用好捐赠资金,通过募集捐赠资金提升大学声誉与社会形象,进而形成良性循环,带动更多社会资源注入高等教育领域,推动我国高等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日子过得越紧,越是要保持定力,越是要开动脑筋。我国高校应在借鉴世界一流大学探索实践的基础上,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源拓展路径。高等教育机构的资源拓展存在一定的规律性,但越来越多呈现出特色化发展趋势,差异化趋势愈发明显。因此,我国高校在资源拓展过程中,应结合学科定位、发展阶段、区位特点等因素构建差异化资源拓展模式,充分发挥高校基金会的平台作用,针对自身发展特点选择蓝海去实现资源拓展。

面对“过紧日子”的形势,高校应对资源拓展进行通盘考虑,形成整体性思维,紧紧围绕自身发展战略,探索资源拓展的新路径、新方式,要在稳住学校发展基本盘,坚守风险控制底线的基础上,做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汇聚更多的社会资源,引入更多的社会力量支持高校发展。

在“双一流”建设与内涵式发展的关键时间节点,“过紧日子”的确是一个不小的挑战,是对我国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全方位考验。然而,这一挑战的有效应对,也能够锤炼大学管理团队,提高高校领导干部搏击风浪的本领,进而推动我国高校转变发展模式,创新办学理念,更好地实现内涵式高质量发展,提升我国高等教育整体水平。

(作者系华北电力大学教育基金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治理研究院研究员)

——漫话——

严防“毒地垫” 要坚持源头治理

石向阳
绘

在柔软厚实的垫子上玩耍不易磕碰,加上清洗简单收纳方便,使得儿童地垫的使用在日常生活中非常普遍。据报道,有媒体记者购买了10款儿童地垫,送第三方检测机构参考相关国际标准和国内的团体标准进行检测后发现,其中6款产品甲醛超标,超标最多的高达17倍。而且,这些“毒地垫”无一例外打着环保名义售卖,多是热销产品。

对此,有论者表示相关监管部门应负起主体责任,既然有了相关标准,就应该按照规定依法查处,对市场的“毒地垫”露头就打,让其没有生存的空间。生产企业要严格遵守相关要求和标准,在技术上更加精益求精,使得相关指标达到国家的规定。

以最高标准确保高考平稳顺利

张立迁

今年高考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国范围内规模最大的一次有组织的集体性活动。为切实做好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高考,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加强考生心理辅导、疏解考生的焦虑情绪,为考点配备必要的防疫物资,做好治安、出行、食宿、卫生等方面的服务,统筹做好考场防暑降温工作,尽量为考生创造一个清凉的考试环境。无疑,这些举措将为考生提供规范化、人性化考试服务,有效提升高考治理服务水平。

高考过程中发现发热咳嗽等症状怎么办,这是广大考生和家长尤为关心的问题。对此,国家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在发布会上明确指出,当考试当天有发热、咳嗽等呼吸道症状的考生,根据个案研判,具备继续考试条件的,可从普通考场转移到备用隔离考场,把转移的时间和专家研判

的时间都算上,耽误的时间可补回。当考试科目结束后,负责研判的专业人员要当场简要地向这些考生作出解释和说明。一旦遇到此类情况,希望考生、家长能够理解,这也是为全体参考人员和考务人员的健康考虑。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保障人民群众最大最紧迫的生命权、健康权,这是对人民立场的最好诠释。

当下,高科技作弊已成为助考犯罪活动的主要方式之一。会上,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作出表态,将以最严厉的手段,会同公安、工信、工商、无线电委员会等部门集中开展净化涉考网络环境行动等五大专项行动,高压打击考试作弊。同时,实施考生身份识别、考试过程视频监控,并运用无线电作弊防控、网上巡查等技术手段,以高科技手段反制高科技作弊。狠抓考场纪律,加强考场检查

和考中巡视,及时防范和处置违规、舞弊行为。应当说,这些坚守高考安全底线的有力举措,就是在维护教育考试公平公正的良好声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大局。

可喜的是,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下,已先期组织实施的2020年全国研究生招生考试工作进展平稳顺利,各界反响积极正面,这也为高考防疫和组考准备奠定了良好的工作基础,提振了坚强的战“疫”信心。做好疫情防控形势下的高考,确保健康高考、公平高考、平稳高考、温馨高考和诚信高考的工作要求,将是对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要求的一次生动实践,也是对保障生命权、确保公平性、坚守安全线、促进科学选才的必然要求。

高等教育已进入普及化教育阶段,高考虽仍是改变命运的一条重要

通道,但它早已不是独木桥。个人命运的走向受到家庭背景、个人禀赋、性格特征,以及不容忽视的个人奋斗、人生际遇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已绝非一次高考所能决定。如果说人生是万里长征,那么高考也仅是其中的重要一站而已。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无数医护人员在战“疫”中逆行,广大普通民众自觉做好隔离防护,各行各业人员保障物资供应,令人无比动容。面对今年的疫情,全体考生不仅经历了知识的教育,也经历了生命的教育、科学的教育,体验了抗疫精神、团结精神、奋斗精神,也学会了自我保护、懂得了责任担当,实现了自我的成长。当下,考生应不背包袱,以平常心轻装上阵。相信作答高考答卷的同时,也必将交出成功的青春答卷。(作者系天津大学研究生院教师)



随着2020年高考日益临近,近日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专题介绍今年高考防疫及组织实施等工作安排,积极回应社会关切。据报道,今年高考报名人数1071万人,比去年增加40万。全国将设考点7000余个,安排监考及考务人员94.5万人。教育部表示,将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在做好高考防疫和组考准备工作方面制定了详细的工作方案,坚持最高标准、最严要求,保障今年高考组织平稳顺利。

